

分科,我学人物画

(上接8月29日6版)

四明山采风

大学一年级,忙忙碌碌,稀里糊涂就过去了。再开学已是二年级。美院开始试行新的教学方案,规定每学年课堂教学35周,劳动和专业实习4周,并在专业教学中调整了基本训练与创作的课时比例,各系各年级基本教学训练得以明确保证。

这学期,我们有了班主任,也确定了各门课程的负责老师,但仍需下乡,当然,绘画写生需要生活实践。这次,我们去温州乐清,一边帮农民插秧,一边采风写生。国画班全体同学加上带队老师,一行20个人,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此时,全国已经进入自然灾害时期,整整持续三年,农民生活困苦。我们沿途能看到光秃秃的树木,据说树皮都被当作粮食吃了。

这次下乡,我们还是吃上了水煮山芋干,已是让人羡慕。我出身农村,能吃苦,不介意。但来自上海的一位同学受不了。一次,他还偷偷溜出去,找农民买鸡蛋吃,结果被人发现,挨了批评。

频繁的下乡劳动,我们真切地感觉到那几年的生活变化。1958年刚入学,走到哪,吃到哪。那时,一切公有,浪费严重。一年后,放任的后果就呈现出来,粮食不足,到哪儿都是一片哀鸿。

李棣生是我同学,黄岩人,擅画山水。系主任派我们去收集革命诗抄,说是作为创作资料派用场。革命遗迹最多的地方,无疑是余姚梁弄的四明山,那里山高林密,当年是打鬼子的游击队活动区,1943年新四军浙东游击队挺进梁弄时,在这里打败过日伪军。

我和李棣生带着随身用品进山。感觉翻山越岭,永无休止,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打游击。将近晚上,我们才到达目的地,在一户农家住下,一人吃了两个山芋。

我们在那里寻找当年的亲历者、目击者,请他们讲抗日游击队的英勇事迹,又去实地考察,收集了不少素材,感到很有收获。完成任务后,我们回去和大部队会合。

大部队的人都盼着回学校,因为学校有白米饭、馒头、稀饭,还有白菜汤。

这次下乡虽辛苦,但我收获很大,陆续创作了很多新体诗,端端正正地抄录在一个本子上。我会作诗的名声,不胫而走。校刊力邀我加盟,后来我担任了编委之一。

大惊失色之解剖课

潘天寿院长强调全面、系统、正规的教育,重视课程设置,期望同学们能有真才实学。在学习态度上,他倡导忘我和投入,要求抓紧时间,练好基本功。

因此,我们课程多,密度高,排课紧凑。这其中,有一门课贯穿始终,就是临摹名画。除此,我们也上素描课。

国画系的素描与油画系不同,更重视线条,而非光影。用线条勾画人物轮廓,这种白描是中国传统技法,生动清晰。当时,国画系的教学方法仍然中西合璧,也有西洋画教学内容。比如,我们上透视学,为的是掌握光影交错,明暗变化,便于立体构图;我们学水彩,老师是潘思同。潘思同说,别看水彩是西洋画的东西,对中国画有用,大家要认真学习。我们还学裱画,装裱工厂很大,有很多技法精湛的师傅。我们自己的画也可以在那里裱。当然,也必须学习装裱技术,而且是必修课。这门课的及格要求是:四尺整张的大画,在不需要帮助的情况下,能独立完成托裱。我很擅长手工活。这门课,我拿到了优秀。



1961年5月 浙江美院63届国画班部分同学来上海写生时,在外滩留影。后排左二为胡振郎。

解剖课留下的记忆最深刻。如果不是科班毕业,很多画家永远不会接触这项内容。按道理,国画系并不需要上这门课,那是雕塑和油画的专业课。因为潘天寿强调全面系统教育,便也给我们安排。

授课地点在杭州医学院。由于心理准备不充分,上课时,国画系的同学无不大惊失色。医生兼老师,从地下室拉出一具遗体,男性,四五十岁,开始上课。他持刀稳健,手法娴熟,边解剖边讲解,告诉大家不同肌肉的名称和作用。我没敢靠近,害怕是其次,主要受不了空气中弥漫的味道。

在美院就读,与名师直接接触,不乏各种长见识的机会。这些名家名师,每一位都才情洋溢,早已闻名。他们教学之余,亦创作不懈。于是,院内各类画展繁多,观摩机会应接不暇,给了我们许多取法乎上的机会。我看过潘天寿的《雨霁》《雨后千山》和巨幅作品《露气》、颜文樑的《大禹陵》、黎冰鸿的《南昌起义》、倪貽德的《繁荣的水乡》、方增先的《说红书》。这些国画令我赞叹不已。我兼容并蓄,也看其他画种,比如版画家张漾兮的水印木刻《西泠桥》、赵宗藻的《四季春》、赵延年的《秋色》

美院的讲座也多。各类学术讲座和创作交流,海报贴得铺天盖地。潘天寿强调,美术是综合艺术,需要吸收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长处。低年级的时候,我们常常外出写生,错过不少听讲座机会。到了四五年级,在校时间增多,集中听了不少,对知识和修养帮助很大。当时,我们对国内一些大画家的名字有了耳闻,去听讲座,一看,不得了,都是响当当的大师。就以1961年下半年学期为例,讲座开了30多场,主讲人有潘天寿、颜文樑、吴茀之、关良,外地请来的叶浅予、石鲁、李琦,还有学者俞剑华等。

回家乡毕业创作

如今,人们提到我,公认是山水画家。只有多年的老友,或一起走过来的同学才知道,当年美院三年级,绘画分科,我的专业方向是人物画。

三年级快结束的时候,开始酝酿分科,四年级一开学,我就到人物画组。我后面的几届,一年级就分科,入学即选定专业方向,算是一项改革。也是在这一年,中央美院和浙江美院,被列为直属重点高等美术学校。这对我们影响不大,大家照常学习和创作。

我本钟意山水,但山水名额少,只有3个,花鸟也选好了4个。剩下的全

部学人物画。老师对我们说,人物画反映工农兵的风貌和时代精神,有不可替代的宣传鼓舞作用。

我在大学期间,经历过两位班主任,一位是周昌谷,他的作品《两个羊羔》获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。另一位是李震坚,分科后的班主任,浙派人物画的领军人物。

寒来暑往,很快就到了大学的最后一年。这一年,全部课程已经结束,我们开始集中精力进行毕业创作。毕业创作很重要,既是五年学习的综合呈现、专业水平的体现,还关乎毕业去向。

毕业创作自然少不了写生。写生点可以选择,听同学们的意见,大部分要求去舟山群岛。我找到支部,说自己有肺病,没彻底好,去舟山过于劳顿,不利康复。组织上说:你必须出去。我当然知道必须出去,我早想好了地点,就说:我去金华,那里是我家乡,水土适应,有利身体。

这样,我回到家乡进行毕业创作。劳坚清先生见我回来,非常高兴,说:你就住在我这儿。我便住了下来。

劳先生有个小女儿,与他住在一起,现在连我一同三人,吃饭和生活主要靠这位小女儿安排,一切都方便。平时,我和劳先生一起出外采风、交流创作。他说:三日不见,刮目相看。说我的画很有专业水平。不久,我们合作赚到了第一笔稿费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,政府要向民众作政治和文化宣传,图画是老少皆宜的好途径。老百姓文化水平低,图画形象直观,一看就懂。特别是在普法教育中,《宪法》《婚姻法》的宣传都是通过图解,许多公共场所都有张贴,大家从中受到教育。金华税务局找到我,要创作一套宣传税法的海报。要求并不高,我又是美术专业画手,我和劳先生合作,很快完成上交,对方很满意,给了几百元稿费,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。这笔钱,我和劳先生平分。劳先生谦让不受,说我的贡献大,后来看我很坚持,也就高兴地收了一半稿费。

这次画税务宣传海报,还让我结识了金华的领导,可以说是家乡的父母官。新中国刚成立时,地委书记一级的官员都是功勋卓著的人物。战争结束,很多部队首长复员转业,到了地方总要安排一个相应位置,很多基层干部都声名显赫,更别说金华地委书记这样的角色了。地委书记是老红军,战争年代聋了的耳朵,是他出生入死的战功标记。

我心里清楚,此次回家乡,主要任务是毕业创作,不能顾此失彼。金华有个水稻专家叫陈双田,长工出身,后来做了领导,报上宣传他,称为“赤脚书记”。他钻研业务,在改良水稻提高亩产方面很有成绩。1962年,他被评选为

全国劳动模范,到首都北京去开英模会。了解到这些情况后,我灵机一动,就以他为原型,创作国画《迎英雄》作为毕业作品。

确定选题后,我便回到学校,准备创作。此时,两个半月过去,去舟山的同学们也回来了,都忙于毕业创作。

毕业作品《迎英雄》是工笔人物画,耗时费力,需要一丝不苟、精益求精,更体现和检验专业水平。一共画了三张,第一张是草稿,第二张自己收藏,至今还妥善保存着,第三张交学校,算毕业作品,1964年还到上海展出过。

这次下生活时间长,我的感受也更深刻。我的体会是,好的创作必须具备两个要素,一是要下生活,融入其中,深刻感悟,把素材理解透;二是要有感情,带着情感创作,情感会转移到作品中,升华出思想和灵魂。读者能从一笔一画感受到作者的情感,从而产生共鸣。

去上海报到

五年的学习接近尾声。

对街的西湖荷花盛开,香远益清,弥漫进美院的校园。空气里有离别的惆怅,大家依依不舍,又意气风发志在四方。毕业典礼在操场举办,潘天寿出席。他给我们写毕业留言。轮到我,他用自来水笔写下一句:品德至上,艺术至上。这是他的一贯思想,我奉行不二,努力为之。

接下来是等待毕业分配,大家都紧张。那个时代,人生的很多大事都由组织决定,学生的分配也由组织包办,据说有的到了单位后,连婚姻大事也由组织考察决定。事实上,往往是分配定终生,因此大家既期待,又忐忑不安。

同学们都很关心,有的有点门道,便四下打探,希望早点明确去向。我也一样,因为是党员,一些信息先到党支部,我们优先知情。组织上也依靠我们,一些同学心里有想法,需要党员去说服。

当时透给我风声,说我可能分配去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,就是我在萧山铁工厂期间,审批我晋升干部的那个单位。我心里暗想,真是缘分。我在杭州待了5年,很喜欢这座城市的繁华与优雅,能留下来工作,也好。

没想到,仅仅两个晚上,原定的分配方案被推翻,新的去向是上海,国画系6位同学,陈家冷、梁洪涛、施立骅、汤起康、卞文瑛和我接到通知,做好去上海工作的准备。美院里,一同要去上海的,还有油画系的秦大虎、邵传谷、步欣农,版画系的王悟生、唐忠等同学。大家都很高兴,毕竟是大上海。

1959年春天,班上组织写生活动,去过一次上海,十几个同学结伴而行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到上海。我们在上海待了三天,印象深刻的就是外滩。

那时,杭州到上海,单程要花费三四个小时。时间有限,我们没去其他地方。这次沪上远足,给我们留下了良好印象。上海成为很多同学向往的城市。没想到,毕业分配竟然去上海,这样工作、生活都在上海,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人,分配去上海的同学没有不愿意的。

后来才了解到分配的一些背景情况。20世纪60年代初,柯庆施政主上海,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,计划从全国招收一批又红又专的大学生,支援上海。上海在全国的地位很高,几乎人人向往,这项号召立即得到各地响应,我们恰逢毕业,理所当然成为目标。这一年,全国共有50多名美术人才来到上海。后来,我在美协,拿着名单通知大家开座谈会,所以知道这个数字。

学校放假前夕,学校通知我去取报到单,去上海报到。

胡振郎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 撰记